

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(俄) 索尔仁尼琴 著

第一圈 (上)

景黎明 译 田大畏 等校订



A. СОЛЖЕНИЦЫН

索尔仁尼琴文集



А.СОЛЖЕНИЦЫН

索 尔 仁 尼 琴 文 集

第一圈 (上)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主要人物表

英诺肯基·阿尔焦米耶维奇·瓦洛金——外交部二级专员，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二女婿

杜布洛莫夫——医学教授，曾为瓦洛金母亲的家庭医生

瓦连京·普梁契科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列夫·鲁宾——语文学家、囚犯

格列布·维肯季耶维奇·涅尔仁——数学家、囚犯

西金——国家安全部少校、玛尔非诺监狱行动特派员

塞拉菲玛·维塔利耶芙娜(小名:西莫齐卡)——监狱职工、中尉

维克托·谢苗诺维奇·阿巴库莫夫——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、大将

米辛——国家安全部少校、玛尔非诺监狱行动特派员

日瓦孔——监狱警卫官、准尉

亚当·罗伊特曼——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助手、声学研究室室长、少校

斯皮里东·叶戈罗夫——囚犯、监督勤杂工

德米特里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索洛格金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安东·尼古拉耶维奇·雅科诺夫——玛尔非诺研究所所长、国家安全部特殊设备局首席工程师、上校

奥斯科卢波夫——国家安全部特殊设备局局长、少将

马穆林——国家安全部特别通讯部前负责人、上校、后入狱被囚

犯称为“戴铁面具的人”

马尔库舍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阿曼泰·布拉托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安德列·安德列耶维奇·波塔波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伊利亚·霍洛布罗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波贝宁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戴尔辛(小名:万尼亚)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塞利瓦诺夫斯基—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

罗斯季斯拉夫·多罗宁(小名:卢斯卡)——大学生、囚犯

格里戈里·鲍里索维奇·阿布拉姆孙——老共产党员、囚犯

泽梅利亚(绰号)——电子学专家、囚犯

克拉拉·马卡雷金娜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小女儿、监狱

职工、中尉

2 米哈伊尔·德米特里耶维奇·柳明——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

亚历山大·波斯克列贝舍夫——斯大林秘书、中将

康德拉绍夫—伊凡诺夫——画家、囚犯

纳捷拉申——监狱警卫官、少尉

克里门节夫——玛尔非诺监狱典狱长、中校

娜佳——囚犯格列布·涅尔仁之妻、研究生

雕刻师——囚犯

伊拉里昂·格拉西莫维奇——物理学光学专家、老囚犯

舒斯特曼——监狱警卫官、中尉

德沃耶焦索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
弗拉基米尔·耶拉斯托维奇·切尔诺夫——教授、囚犯

尼古拉·加拉霍夫——作家,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大女婿

卡迈香——监狱官、中尉

拉丽莎·叶米娜——监狱职工

- 鲍里斯·谢尔盖耶维奇·斯杰潘诺夫——玛尔非诺党支部书记
巴尔班纽克——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、少将
斯莫洛西多夫——国家安全部中尉
伊万——玻璃工人、囚犯
娜塔丽娅·格拉西莫维奇(爱称:娜塔莎)——囚犯格拉西莫维奇之妻
彼得·马卡雷金——检察官、少将
狄奈拉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的大女儿、作家尼古拉·加拉霍夫之妻
多特娜拉(小名:多蒂)——检察官彼得·马卡雷金之二女儿、外交参事英诺肯基·瓦洛金之妻
塔玛拉——监狱职工
阿廖沙·兰斯基——文学评论家
奥尔加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
穆莎—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
柳德米拉——莫斯科大学进修生
克雷卡乔夫——玛尔非诺原党支部书记、中尉
亚瑟·西罗马哈——囚犯、密探
维克托·柳比米切夫——囚犯、密探
奥罗宾塞夫——化学博士、囚犯
罗马绍夫——工程师、囚犯
肖慕什金——设计师、囚犯

第 一 章

架子上，那座青铜时钟生了锈的指针，正指着四点五十五分。

这是深冬季节。

灰蒙蒙的天空和即将消逝的日光，使那座钟看上去显得更加灰暗了。嵌有双层玻璃的高大落地窗，俯视着下面街道上疾驰而过的车辆和正在铲雪的守门人。雪刚落下不久，但已经浸湿了地面，由于来往路人的践踏，甚至已变得污秽不堪了。

二级专员英诺肯基·瓦洛金，凭窗伫立，盲目地凝望着街上的行人，尖声尖气地吹着口哨。他的手指不停地翻着一本光泽夺目的外国杂志，但眼睛却没有停留在杂志上。

二级专员长得又高又瘦。他的职衔相当于外交系统的中校。但他没有穿制服，而是穿着一件闪光的上衣，看上去像一名年轻、富有的高等游民，使人难以置信他会是外交部一名担任要职的官员。

下午五点钟不是工作日的结束，要么该继续把办公室的灯打开，要么该准备回家了。但参事既没有开灯，也不打算回家。

此刻，事实上人人都在准备回家。回家去吃饭、休息、或打

一个盹。到十点光景,莫斯科四十五个联盟级部和二十个共和国级部成千上万的窗户,将重新灯火通明。在那壁垒森严的要塞式的墙壁内,有一个人备受失眠之苦——但他却因此训练了莫斯科全体官员,让他们陪同他一道熬更守夜,直到清晨。深知他的习惯,所有的部长像小学生一样静静地坐着,等待他的召唤;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,部长们便去传唤副部长,副部长们又去折磨科长;那些资料员沿着梯子爬上爬下,寻找着卡片索引;办事员们在走廊上跑来跑去;而秘书们则写断了一支又一支的铅笔……

现在,正逢西方圣诞前夜。所有的大使馆已冷冷清清,电话保持着沉默。外交官们很可能已坐在圣诞树前。当然,外交部里照常有夜间工作。值班人员趁机下象棋,讲逗趣的故事,或者索性躺在沙发上。但工作仍照常进行。

2 英诺肯基·瓦洛金紧张不安的手指漫无目的地迅速翻着杂志,内心里隐约闪现的恐惧的火花时而上升成小小的火焰,时而熄灭,使他不寒而栗。

自从孩提时代起,英诺肯基·阿尔焦米耶维奇·瓦洛金就认识杜布洛莫夫医生。在杜布洛莫夫成名之前,在他参加代表团出国之前,甚至在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人们的话题之前,英诺肯基就认识了杜布洛莫夫——他是他们的家庭医生。英诺肯基的母亲总是找他看病。母亲经常生病,除了杜布洛莫夫,她谁也不信任。只要杜布洛莫夫在大厅里脱下海狸帽子,整个套房就洋溢着友爱、镇静和信赖的气氛。在母亲的床边,杜布洛莫夫医生总是要呆半个多小时,不厌其烦地认真询问症状,仔细检查病人,详细解释治疗的每一细节,仿佛他是世界上最不忙的人。每当他离去之时,从英诺肯基身边走过,总是要停下来,向这个小男孩提点什么问题,并严肃地等待着回答,似乎他真的期待着小

孩给予既聪明又至关重要的答复似的。那时，医生的头发已经灰白……

扔下手中的杂志，英诺肯基打了一个寒战，心有所思地在房里踱来踱去。

他该不该给医生打一个电话呢？

假若这件事涉及的是另一个人——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某位专家——英诺肯基就绝对不会冒险要去警告他。然而，这恰恰是杜布洛莫夫医生……

如果从公共电话间打电话，一完就立刻离开，会不会被人发现呢？他们难道还能从电话里辨认出那闷塞的声音吗？肯定不能——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技术。

他走向书桌。在灰暗的房间里，他只能辨认出最新工作指令的最上面一页：他即将被派遣到国外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，总之，在新年之前，他就必须乘飞机离去。

最明智的办法是等待；是呀，等待才是最明智的。

天哪！一股寒战扫过他的肩头——那不习惯承担千斤重担的肩头！如果他根本没有听说那事，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该有多好啊！

他把桌上所有的文件收在一堆，放进保险箱里。

杜布洛莫夫应允要做的那事，怎么会触犯王法呢？正如一切有天性的人那样，医生更是慷慨无私的；一个天才者的知识，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，总是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的。

英诺肯基内心的不安愈来愈强烈。他把头靠在保险箱上，闭上眼睛略事休息。

突然，好像机会的最后片刻就要消失了似的，他没有打电话叫汽车，甚至没有关上墨水瓶盖，就冲了出去，锁上门，把钥匙交给走廊尽头的值日官。他穿着便装，跑下楼梯，从那些穿着绣金

和金缙制服的本机关职员们身旁疾走而过，冲进了那阴冷的黄昏。

外交部半围的院坝里，耸立着瓦·瓦·沃罗夫斯基^①的纪念碑。从纪念碑前走过，大卢比扬卡^②广场上那座新楼跃入眼帘。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！此刻，这座大楼对他似乎别有含义：那灰暗外壳的九层高楼，分明是一艘战舰；那战舰右舷的十八个壁柱，分明就是十八座炮塔！英诺肯基感到了孤独和虚弱。他不由自主地穿过小广场，被大楼吸引过去，就像乘着一艘小艇追随着飞速前进的庞大战舰一样。

接着，他转身逃走，径自朝着铁匠桥街方向走去。在广场外的市场附近正有一辆出租汽车正准备开走。英诺肯基爬进出租汽车，命司机急驶过铁匠桥街，然后左转，朝着彼特罗夫卡开去。

此时，路灯刚刚点亮。

4 他始终犹豫不决，寻思着在哪里打电话可以不受干扰，至少没有人用硬币敲打公用电话亭的玻璃。可是，要着意寻找一个安静、偏僻的电话间，这一行动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；也许还是在这里挑选为上策，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人群，但一定要选一个隔音的，电话应安装在墙里面的。突然，他又想到，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，让司机成了见证人，这有多么轻率啊！他立即在口袋里搜寻车费。然而，他又很快镇静下来，感悟到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，事已无选择余地，无论是危险还是安全，都得即刻打电话。

如果畏首畏尾，还能算一个人吗？

① 瓦·瓦·沃罗夫斯基：1871—1923，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家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之一。十月革命后担任驻外使节，1923年遭暗杀。

② 大卢比扬卡：莫斯科市一个广场的名称，一度改名为捷尔仁斯基广场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、内务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国家安全委员会（克格勃）先后设立于该广场上的原俄国保险公司大楼内。

车驶到猎市大街交通信号灯处，他在口袋里摸到的不是硬币，而是两张十五戈比的纸币——这是吉兆。

过了莫斯科大学朝后转，出租汽车加速开上阿尔巴特街。英诺肯基把两张纸币给了司机，没有要司机找零钱，就下了车，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穿过广场。

这时已华灯齐放。电影院门前，人们已排队买票，等待着《芭蕾女演员的爱情》的开映。地铁站上方用红色霓虹灯所显示的“地铁”二字，被笼罩在灰蒙蒙的雾中。一个像吉普赛人的少女，正在叫卖黄色的花。

不管怎样，他必须抓紧时间，尽可能长话短说。然后迅疾挂断电话，把危险减低到最小程度。

他挺着胸，笔直地朝前走。一个姑娘从他身旁匆匆走过时，抬头望了望他。

接着，又一个姑娘从他身旁匆匆而过。

车站外面的一排电话间中，正好有一个空着，但他从它旁边走过，径自进了车站。

车站里有四个电话间——电话机嵌在墙内——都被占用，惟见左边最后一个电话间里，一个头发蓬乱、似有些微醉的小伙子正在放下电话听筒。英诺肯基迅速填补上去，把沉重的玻璃门关过来。他一只手拉着门，让它一直关紧，另一只手哆嗦慌乱地把硬币丢进投钱口。

几声长长的鸣响后，对方拿起了听筒。

“喂？”一个女人含怒的声音，仿佛她是在代人受忙似的。

“是杜布洛莫夫教授的公寓吗？”他尽力改变讲话的腔调。

“是的！”

“请问，我可以和他讲话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拖长腔调，懒洋洋地反问。那女人肯定极为舒适

地坐在沙发里。

“事实上——你不认识我——但这无关紧要——请你叫他来接电话，行吗？一件十分紧急的事！”

（这些多余的话都是为了礼貌！）

“但你不可能期待教授会和每一个打电话的张三或者李四讲话！”女人生气了。听上去她似乎立刻就要放下听筒。

在玻璃门外，离这排电话间一码处的地方，人们匆匆走过，你追我赶。却已经有人在他的电话间门外等候着了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不能说出你的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是一个好心人。我有重要消息告诉教授！”

“你是一个好心人，又怎么样？为什么你害怕说出你的名字？”

（该挂上电话了。男人千万不要娶愚蠢的老婆！）

“那么，你是谁？你是他的妻子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先告诉你？你先告诉我你是谁！”

他本来应该就此结束。但这件事不仅仅涉及教授一人——到现在，他已经非常激动，不再企图掩饰他的声音或者压低声音，而是热烈地请求：

“听我讲，听着！我不得不警告他，他正面临着危险！”

“他面临着危险？”她的声音放低了，停了下来。但她没有去叫她丈夫——噢，没有！“我更有理由不叫他来！你也许在撒谎！你怎么才能证明你没有撒谎呢？”

英诺肯基脚下的地板似乎燃烧起来，他的脚被烧得发烫；黑色听筒和卷曲而沉重的电话线，也正烧灼着他的手。

“听我讲！听着！”他绝望地叫喊起来，“教授上次被派到巴黎去时，曾向他的法国同事们许诺，答应赠送他们一些东西！一些药品！据说几天内就要履行他的诺言了，要把药品交给外国

第二章

8 透过门侧那深红色的灯光,玻璃灯罩上书写的“业务用房”二字耀人眼目;在门上那块光泽如镜的小牌表面,凸现着“严禁闲人入内”几个字。门前的那张小桌后面,总是坐着一个守卫,他态度严厉地检查着进出房门者的特许证。房门尽处的墙头,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宣传画,要求人们“禁这禁那”。

其实,这是一条普通的走廊:只是稍许干净些,中间铺着窄幅的红色地毯,镶木地板上的蜡打得恰到好处,两侧的痰盂也整齐地安放在最佳位置;每道房门都一律用黑色的皮面蒙着,里面塞满了厚实的填料,上面巧妙地排列着白色的铆钉,并开了一个嵌镜的椭圆形小孔。

然而,这里确乎绝对安静,极难看见有人来回走动。即使是已在其中某个房间工作的人,也绝不互相来往。对隔壁房间的了解,比了解马达加斯加的市场新闻,还困难。

夜色是阴沉的。

在莫斯科中央自动电话局的大楼里,在那条被禁止通行的走廊尽头,两位安全部的中尉军官正在那个“严禁闲人入内”的房间里值班。他们的表情和夜色一样阴沉,不时透露出不得不

忠于职守的无奈情绪。

这个神秘的房间，在大楼管理处主任那儿，被排列在“194号”；而在国家安全部六局六处那儿，被称为“A-1 信息站”。

房的一边墙上，装置着特大的信号台及各种控制板。各类电话监测仪的塑料部分虽已灰黑，但金属部件仍闪闪发亮。房间的另一边墙上，挂着一张书写在灰白色纸上的《值班规程》。严格按照《规程》操作，才可避免监听和记录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异常。两个值班人员的职责是：一人戴着耳机，全神贯注地实施监听；另一个守候在旁，每半小时后便替下同伴。

然而，《规程》也有被违反的时候。比如这一次，并不是因为值班人员是新手，恰恰相反，正是他们富有经验，才敢大胆相信，此刻既逢西方人的圣诞前夜，便不大可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。他们应当无事可做。这有如国家制度在理想意义中的完美无缺，与令人遗憾的缺点之间常有的悲剧性矛盾一样，结果便常常不是完美无缺的。

这也难怪。下周星期一的政治学习会上，长着一副大鼻子的秋金中尉，将接受严格的考问。比如：谁是人民的朋友？谁是人民的敌人？人民的朋友是怎样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？为什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需要分裂^①是正确的？为什么第五次代表大会^②上需要联合也是正确的？为什么从第六次代表大会^③以后各自为政又是无可非议的呢？……面对这类高深的问题，大鼻子中尉竟然有点满不在乎。他没有按照规定去阅读和理解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。更严重的是，上星期日期

① 第二次代表大会：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，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。

② 第五次代表大会：指1907年该党第五次（伦敦）代表大会。

③ 第六次代表大会：指1917年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。

下班后,他竟然还与姐夫一起饮酒,喝得酩酊大醉,以至星期一早晨不得不喝了解酒药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政治学习会场。酒意是退了,但脑子里也只剩下了一片空白。会后,党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了秋金,并把他叫到局里去,对他的学习问题特别作了布置。这回,已经不再要他作口头回答了,而是责成他在下周一的例行政治学习会上呈交一份答案提纲,并接受考问。

一周快要过完了,秋金并没有为提纲的事付出相应的时间。他在拖延。直至这次上班的时候,他才慌了起来。不过,经验告诉他,今晚无须操心西方国家驻苏大使馆里已经沉默了的电话,并征得同伴的允诺,他舒服地坐在房间角落的台灯下,开始抄录起《简明教程》中的有关内容。一会儿抄到笔记本的这个地方,一会儿抄到那个地方。

1
0 同伴库列绍夫,中尉,长着肥胖的下巴,一头卷发。他戴着耳机坐在监测仪前,甚至不屑于打开屋顶的主灯,只让录音机旁的小灯亮着,情绪十分烦躁。因为上午一过,各使馆便已购足节日需要的物品,接着,便好像已经酣睡了,死去了,午饭后便不再有过一次电话铃声了。

那样乏味地坐着,库列绍夫只得着意于自己左腿上的那块脓疮来。这些不名所以的脓疮,虽经磺胺软膏的涂抹,却并未见好,竟又有所扩散。疼痛已妨碍着他的行走,国家安全部的诊疗所已同意他别求专家诊治了。不久前他刚分到一套住房,妻子也快要生孩子了。哎,这脓疮,实在令人扫兴!

库列绍夫禁不住摘下了紧箍在耳旁的耳机,相宜地凑近灯光,卷起了左腿上的裤管。他小心地触摸着那些断裂的疮痂,稍加挤压便流出了褐色的脓血。刺耳的疼痛顿时使他警觉起来,他第一次被这样的念头震撼了:

“这决不是一般的脓疮,而……而是……”

曾经听人说的那个可怕的名词，突然闯进了他的记忆：

“坏疽！——对，坏疽！”

他的心收紧了。

“天哪，不知怎么的呢！”

过了好一阵……

又过了好一阵……

库列绍夫才发现，那自动接通的录音机，已无声地旋转起来了。

他没有将那只裸露的腿从台架上挪下来，只是勉强地够到耳机，把其中的一只放在耳边。

……

“你怎么才能证明你没有撒谎呢？”

“……你意识到了吗？他不能这样做！他不能给外国人任何东西！否则，他将被看成是……”

呀，原子弹！

惊讶使库列绍夫已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无意识行动：

他迅速把腿放下来，抓起电线插座，拔去了交换机的枢纽。电话断路了。

他此刻闪动着的想法是：管他妈的什么《规程》，让《规程》见鬼去吧！管他妈是谁通的话，只要老子不予登记，不就一了百了！

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。大鼻子正忙着抄录，什么也未看见。他俩是好朋友，这当然不妨碍他奉命对朋友予以监视；他当然也清楚，秋金又何尝不负有同样的使命？

库列绍夫用颤抖的手,把那危险的录音带转换到相反的缠圈,并接通大使馆的电路。他想用这办法洗去带上的录音,并不留痕迹地隐匿自己的行为。

然而,另外一种情况又即刻警告着他:上司曾不止一次地宣告过,这里自动录音的结果也将同时留存在另一个工作室里;真是如此,他销毁录音的结果便失去了意义,他的行为也难以隐匿。他将面临杀身之灾!

他只得改变初衷,把录音带重新整理好,听了一遍。罪犯显得着急、激动。他是在什么位置讲话呢?当然,他不会从自己的住宅,也不会在工作单位。那些人不总是从公用电话亭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的吗?

库列绍夫把公用电话亭的名册打开,根据仪器显示的信号,迅速确定了电话亭的位置。

“更卡!更卡!”

库列绍夫放下了裤管,嘶哑地呼叫起来。

“接行动处①!——行动处!”

“全体动员!全体动员!”

“索科尔尼基地铁站!”

“进口处,楼梯旁!”

“也许,还能就地抓住他!”

① 行动处:国家安全部行动处,也可称“外勤处”。该处干部称“行动人员”(即“外勤”);该处派往劳改场所的管教人员称“行动特派员”。

第三章

“瞧，又有来客啦！”

“唷，他们又带来一批新家伙！”

新来的犯人走进长廊，玛尔非诺^①的老犯人立即围了上去。他们中的一些人正要去吃饭，另一些人刚吃过饭。

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朋友们！”

“从哪来的？”

“你们胸部和帽子上的补丁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你是问补丁吗？那是缝补号码布的痕迹呀，”一位新来者说，“我们的背上和膝部也有啦！在被押离劳改营时，那些号码布被扯去了！”

“号码——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先生们！”瓦连京·普梁契科夫说。“你们谁能告诉我，我们究竟生活在哪个世纪？”他转向他的朋友列夫·鲁宾，继续说。“在人的身上贴号码，这就是你常讲的那种进步吗？”

“不要开玩笑，瓦连京！”鲁宾说。“去吃你的饭吧！”

“可是，有这样一些头上贴有号码的人在周围晃动，我能吃

^① 玛尔非诺：设在莫斯科郊区玛尔非诺村的特种监狱，即“玛尔非诺研究所”。